

隋煬帝評議 —— 以其國際視野為中心

楊永安博士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名譽副教授

甲 內容簡介

本節的主題人物為隋煬帝（公元 569 – 618 年）。傳統史家一向以成王敗寇的標準，推崇唐太宗（公元 598 – 649 年）而貶斥隋煬帝，忽略他在內政外交上的成就和貢獻。事實上，煬帝兼備太宗文武兼重的特質，一度在文治武功上令楊隋皇朝臻至盛世之境，而他的對外政策，亦影響日後唐代軍事外交的布局，故他是一位頗有統治能力的君主。

乙 講座摘記

1. 廿一世紀以前對隋煬帝評價的變化

每當提及隋煬帝時，就會聯想到這些貶義字詞——「耽於逸樂」、「不恤民命」、「巡幸無道」、「好大喜功」、「濫用民力」、「貪財揮霍」……中國人撰寫歷史慣以「失敗的總結」作為前朝帝主的蓋棺定論，這或許有點不公允。

《陳書·陳後主本紀》記載魏徵（公元 580 – 643 年）一段說話：「後主生深宮之手，長婦人之手……古人有言：亡國之主，多有才藝，考之梁、陳及隋，信非虛論。」魏徵對隋煬帝的負面評價，在書中比比皆是。他撰寫歷史是用以勸諫君主，故每每嚴厲批評隋煬帝，或誹議前朝亡國之君，藉此希望唐太宗引以為戒。因此，他的筆下自然不會褒揚隋煬帝。

在近當代的史書中，史家多採納較傳統的觀點來評價隋代大業年間的政治。簡單而言，就是用儒家「重文治」的評價標準。儒家提倡節儉，以民為本，可是隋煬帝卻不恤民力，毫不節儉。於是史家幾乎是一面倒對隋煬帝給予負面評價。

上世紀六十年代，西方漢學家 Arthur Wright（譯名：芮沃壽）對隋煬帝有別於傳統的看法。他認為傳統上沒有一位撰寫歷史的人提過隋煬帝在大業七年（公元 611 年）之前是荒於政事，無論是

《隋書》或《資治通鑑》也沒提出此論點，故他認為隋煬帝也算得上是一位理政的君主。翻看正史，雖可批評他生活窮奢極侈、好大喜功，卻不可否定他也有勤政的一面。另外，史學家金寶祥也特別提出隋煬帝繼承文帝的對外政策，而且部署甚有條理，由此印證他並非庸主。

2. 隋煬帝即位前的歷史

開皇元年（公元 581 年），楊堅稱帝，楊廣受冊封為晉王，當時他年僅 13 歲。他後來成為并州總管、河北行臺尚書令，18 歲時入朝成為內史令，主理朝中行政工作。他又當過雍州牧，是隋代九個行政區域之一，管轄 22 個郡。由此可見，他在內政和地方行政方面都累積了不少經驗。另外，他也有建立軍功，在開皇九年（公元 589 年）受封為平陳元帥，平定南方最後的政權——陳朝。自此，他晉升太尉，其後調遣到北方擔任并州總管，并州即今日的太原，也即是後來李淵（公元 566 – 635 年）任留守的地方，主要從事防禦突厥的工作。後來，其弟秦王俊（公元 571 – 600 年）鎮守江南不成功，激起民變，隋文帝遂任命楊廣為揚州總管，為行軍元帥，全權掌管江南地區的軍務。他鎮守南方時，慮及南方流行佛教信仰，故採取佛、道並重的政策，以懷柔手段緩和南人對抗的心理。以上例子證明不論是中央軍事要務，抑或是地方行政，煬帝均有參與，並累積豐富的經驗。此足可否定「楊廣一無是處」的評價。正史刻意淡化他的功勳（音：分），實在有欠公允。

3. 大業年間的內政及改革

改革科舉制度及打擊士族勢力

隋文帝即位後廢除九品中正制。《隋書·煬帝紀上》提及大業三年（公元 607 年）設有十科舉人，兩年後減至四科舉人。這些舉人多是秉持傳統儒家思想的賢良方正之人，但在煬帝心目中需要的

是真才實學的治國人才。因此，他改置明經科和進士科。在其後唐代的科舉制度中，就是主要靠明經科和進士科來選拔人才。唐代明經科考核經學和時務策，而進士科則主要考核詩賦。在古代中國的選士制度變革之中，隋煬帝扮演着一個很重要的角色。

煬帝改革上述制度，旨在打擊和削弱山東士族的勢力。大業三年（公元 607 年）至五年（公元 609 年）前後，他曾下兩度詔令，所有跟隨文帝由西魏、北魏過渡到北周期間，或幫助文帝奪位的勳官皆不能轉授文武職位，而勳官以下的子弟再沒有功勳者，隔一代之後其品秩會一直下降，無功者將會完全失去品秩。從這方面可看到煬帝求才的用心，追求的是具備真才實學的官員，而不是承襲官勳和依靠祖蔭來壟斷官職的傳統勢力。

廢除諸州總管府

隋煬帝曾任并州總管和揚州總管，他明白若地方擁有軍權，會對中央構成極大危險。而據史記載，在楊廣即位之初，他的五弟楊諒（公元 575 – 605 年）便以慶州總管之名起兵反抗，所以他即位之後便廢了諸州總管府，削弱地方勢力。

削弱尚書台職權

隋文帝在位時，尚書令的職位一直懸空。隋文帝對大臣猜疑多忌，曾誅殺功臣，在位時期只曾命高穎（音：炯）（公元 541 – 607 年）、趙昺（音：炯）（公元 532 – 599 年）等人任尚書左僕射。隋煬帝即位後，命楊素（公元 544 – 606 年）為尚書令，以酬答他協助奪嫡的功勞。他其後亦曾命蘇威（公元 542 – 623 年）為尚書右僕射。直至楊素去世，蘇威因罪被貶，尚書令、尚書左、右僕射才懸空，只餘下尚書左右丞行尚書之職，其下設都司郎。大業三年（公元 607 年）之前，煬帝基本上是有心理會政事，但隨着他在對外的戰爭

取得勝利，漸生驕奢之心，又因經常四出巡幸，最終無法兼顧政事。總言之，煬帝削弱尚書令和尚書左右僕射之職權，貫徹君主集權，至唐朝時仍一直沿用，對後世影響尤大。

改革兵制

隋代兵制改革始於煬帝。煬帝首次出兵高麗時發現府兵的攻擊力不足，府兵制只適用於防守而不利進攻；而且只限於小國寡民的防守，大一統國家並不奏效。在「將不知兵，兵不知將」的情況下，只會失敗告終。煬帝於是決定採取徵兵制和募兵制並行的方法，由十二衛府擴大至十六衛府，在新增設的四個衛府設立驍（音：囂）果。在傳統的府兵制之中，高級將領被關隴（音：壘）集團世代將相壟斷，很多南方人無上進之路。煬帝設立驍果，招募對象不分地區，故吸引不少來自江南地區的人，他們希望藉軍功獲得晉升機會。新的兵制成效顯著，驍果曾經多達十萬人，能擴充兵源，並增強國家軍事力量。由此可見，煬帝具有出色的軍事知識和遠大的目光。

4. 再看煬帝的各項建設

東都洛陽

煬帝即位之初，他的五弟漢王楊諒在并州兵分三路南下討伐楊廣，他在平亂時命人挖坑以保護倉庫。《隋書·煬帝紀上》：「今者漢王諒悖逆，毒被山東，遂使州縣或淪非所。此由關河懸遠，兵不赴急，加以并州移戶復在河南。周遷殷人，意在於此。況復南服遐（音：霞）遠，東夏殷大，因機順動，今也其時。」此提及他要經營倉庫，或經營東都，而更最重要的考慮是將楊諒的叛黨安排在河南地區，以便監察。根據正史，煬帝興建顯仁宮，宏偉奢侈，他在大業五年（公元609年）至六年（公元610年），在東都內設百戲來招待西域酋長、域外可汗、使節等人。另一方面，煬帝

以喜好巡幸著名，洛陽作為全國的中心點，匯聚全國所有的道路網絡、運河網絡，因此東都洛陽便成為最理想的起點。

南北大運河

隋文帝在位時開渠引杜陽水作為灌溉三時原之用，又開鑿廣通渠、疏浚山陽瀆（音：讀）等。煬帝以文帝開鑿的運河為基礎，擴大開鑿的規模。由於長安和洛陽的地理位置偏西，地勢稍高，而長安的地勢又比洛陽為高，從陸路運送糧食至地勢稍高的長安相較困難，所以當時大部分糧倉皆集中在洛陽附近，這促使煬帝構想以運河運輸糧食之想法；另外，關東地區至太行山以東一帶，經常出現黃河氾濫的情況，氾濫之時，山東、太行山以下地方會全被淹沒，為了防治河災，煬帝興建了兩條運河，在黃河氾濫期間可以疏導河水。由此可見，運河的興建，除了大家所知是供煬帝巡幸江東之原因外，還有其他實際考量。

煬帝確實喜歡巡幸各地，尤其是江南揚州等地，無論是《大業雜記》、《資治通鑑》也有引用：「江東諸帝多傳脂粉，不與百姓相見，此何理也？」煬帝巡幸南方，除了基於個人享樂之外，亦反映他極為重視南方地區的發展。他擔任揚州總管期間，厲行銷兵政策，沒收刀劍；嚴禁造船，以防範南方造船出海時造反；他又禁修國史，對南方地區嚴厲監控¹。另外，煬帝十分重視文教，大力發展經學，如徵召南人為學士從事撰述典籍的工作，在他的積極推動下，陸德明（約公元550 – 630年）、孔穎達（公元574 – 648年）等大儒相繼湧現。劉炫（約公元546 – 約613年）、劉焯（公元544 – 610年）二人，在文帝時不受重用，曾被貶為文帝第四兒子蜀王秀（公元573 – 618年）的伴讀，但隋煬帝在位時重召二人回京，負責編修儒家經書，這些經學註解更成為日後唐代最重要的經學根據。傳統史家只聚焦於他巡幸時的揮霍享樂，卻忽略他對江南地區的發展和貢獻。

¹ 禁修國史有利在思想上對南方進行控制。

5. 煬帝外交政策的反思和評價

攻打林邑

煬帝非常景仰秦始皇（公元前 259 年 – 前 210 年）和漢武帝（公元前 156 年 – 前 87 年）的武功，渴望隋朝在疆域上能與秦漢看齊，故即位後延續文帝末年用兵林邑（音：泣）的軍事政策。

和親、離間、巡幸突厥

文帝初年，突厥南下侵略河右（河西走廊附近）。根據隋書記載：「突厥之虜，俱通二國」，即指北齊和北周已經私結突厥。隋煬帝繼承文帝的和親、離間政策，以作應對。隋文帝十分厚待突厥沙鉢略可汗（？ – 公元 587 年）的弟弟處羅侯（？ – 公元 588 年），希望培植他來分化突厥，後來處羅侯戰死，文帝遂扶助他的兒子染干（？ – 公元 609 年）成為東突厥最大的可汗，亦即後來的啟民可汗。煬帝在大業三年（公元 607 年）出巡東突厥，建造極盡豪華的觀風行殿，作為出巡的行宮，就是為了顯示隋朝的富強。隋煬帝繼承文帝和親、離間的政策，使啟民可汗臣服於隋，成功解除突厥對隋的威脅。

攻打吐谷渾

煬帝在大業三年（公元 607 年）出巡之後，認為突厥已臣服於隋，故隨後將對外政策的重點轉移至吐谷渾（音：突肉雲）。傳統史家認為煬帝出兵吐谷渾是受讒臣所惑，或是為了取得火鼠皮²、舞女、以及西域的奇珍異寶而窮兵黷武，這完全是以儒家道統史觀而作出的批評。事實上，《隋書·裴矩傳》記：「突厥、吐渾分領羌胡之國」，說出突厥、吐谷渾的存在阻礙了其他弱小民族或少數部落對中國通商和朝貢。昔日高麗連繫了突厥、吐谷渾和南方的陳朝，對隋朝進行圍堵。隋文帝遂先出兵擊破南方的陳朝，然後以金錢利誘突厥貴族臣服於隋，並冊封其可汗，對於不肯臣服的吐谷渾則直接出兵討伐。煬帝御駕督師吐谷渾戰役，藉此樹立英武君王的形象。煬帝本打算與東突厥啟民可汗合兵攻打吐谷渾，可惜啟民可汗在大業五年（公元 609 年）逝世，繼承者始畢可汗對煬帝並不恭順，故無法組成聯軍。後來煬帝指使鐵勒部落攻打吐谷渾，成功將之消滅，並建立了四郡八縣。故正史言：「祁連以南，雪山以北，東西四千里，南北二千里，皆為隋有」，自此，隋朝取得了天山南北路的控制權。

隨後，隋朝更取得伊吾（今新疆哈密）控制權，高昌國因而順服。西突厥曾聯繫鐵勒部落包圍隋朝，但最終失敗，並在大業七年（公元 611 年）臣服於隋，至此「東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一萬四千八百里，東南皆至於海，西至且末，北至五原，隋氏之盛，極於此也」，隋朝基本上已經解除與西突厥族的邊患問題。

三征高麗

文帝在位時期已下詔征討高麗，當時高麗曾與高昌和西突厥聯合包圍隋朝，及後隋朝利用經濟或外交手段將其逐一擊破。煬帝即位後，貫徹文帝的對外政策，至大業七年（公元 611 年），除高麗以外，隋朝已基本消除了其他邊族的威脅。加上當時籌備多年的運河工作亦告完成，隋朝已具備對高麗用兵的條件，及後三度出兵高麗。

傳統史家普遍認為三征高麗純粹只是煬帝好大喜功、窮兵黷武之舉，又認為他只是藉口高麗不朝而興師問罪。其實，若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，征伐高麗是有其道理。楊隋皇朝的祖先是在鮮卑政權下長大，十分了解東北地方是非常富庶的。有別於西北地區的遊牧民族，東北地區早已發展農耕畜牧，地理環境和季節氣候都有利農耕種植，故逐漸發展為半漁獵半農耕的民族。在劉宋時期，該地區已出現城池的概念，這樣的經濟發展使高麗變得更加強大，遂成隋朝東北隱患。所以，隋建國之初的主要外患來自西北，後來主要的外患則來自東北。隨着首都的遷移、邊患的改變，在國防考慮下，東都京師的駐軍隨之而增多，再加上東突厥、西突厥的問題已經解決，餘下的就只有高麗了。

6. 小結：隋煬帝和唐太宗

隋煬帝和唐太宗有不少相同之處，例如二人都是以庶子之名奪嫡而得位、在即位之前建立不少軍功、在即位之後用兵高麗等。二人在軍事策略、外交政策方面如出一轍，先對付正北方的東突厥，然後是吐谷渾、西突厥，最後是高麗。此外，二人同樣「用人唯親」，特別見於征高麗之役，隋煬帝重用奪嫡功臣宇文述，唐太宗則重用大舅長孫無忌（公元 594 - 659 年），而長孫無忌是謀劃「玄武門之變」的最重要功臣。後人推崇和讚譽的只有唐太宗，卻甚少提及隋煬帝在外交和軍事政策的識見。在傳統史觀下，唐太宗是「成功」的君主，而隋煬帝則是「失敗」的樣本。

² 傳說火鼠可於火裏存活，故其皮有防火、不被火燒燬之效。